

中国陶瓷在海外（代序）

据《东方早报》报道，英国伦敦克里斯蒂拍卖公司2005年7月进行的“中国瓷器及艺术品”拍卖中，一款元代青花“鬼谷下山”人物罐以1400万英镑的价格成交，折合人民币2.3亿多元，创造了目前中国瓷器价格的世界最高记录。

从18世纪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上打捞上来的中国外销瓷，于2006年9月在北京故宫午门城楼展出，这次名为“瑞典藏中国外销瓷展”的展览共展出181件瓷器。

2007年1月，英国苏富比拍卖公司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拍卖了从越南海域打捞上来的约7.5万件中国清代青花瓷器，引起了全球收藏家的关注。为期3天的5场拍卖会取得了300万欧元的总成交额，高出了此前200万欧元的估价。

已故上海博物馆汪庆正馆长参观土耳其托普卡卜博物馆藏中国瓷器时说：“此次考察，我的题目是世界各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青花瓷与托普卡卜博物馆藏中国早期青花瓷的比较，不见实物根本无法想象这批青花瓷会如此精美。这批青花瓷的制作、纹饰、造型都非常特殊，青花发色比常见的青花瓷要鲜亮且细致清晰。能亲自上手，这样的机会是绝不会再有的，回国后一定要出版一系列的考察报告，这将成为各国学者研究、对比中国青花瓷生产、发展一定要引用的材料。”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古陶瓷专家刘新园先生也诙谐地说：“这就是寻宝嘛！景德镇还没有找到元代青花瓷生产遗存，大量文献证明当时中国最好的、最合格的青花产品都送到了西亚，这些青花瓷很多陶瓷专家会认不得，因为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么精美、特殊的元青花。”北京故宫博物院李辉炳先生也说：“不到土耳其亲眼看一看这批元青花，中国的陶瓷专家死不瞑目！”

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说：“陶瓷之路是跨越中世纪东西方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日]三上次男

《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胡德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瓷器史学发展和研究显示：瓷器诞生在中国，瓷器也在国外。瓷学本在中国，瓷学也在国外。

考古表明：陶器的诞生在中国已经有1万年以上的历史，而中国成熟瓷器的诞生距今约2000年。2000年来中国瓷器由创烧、发展到影响形成了世界性的瓷器现象。毫无疑问，中国瓷器的主体地位为此获得了代表中国（“China”）的美誉。从汉代到唐代，是中国瓷器的产生、发展到成熟阶段，唐代以后中国瓷器走向精练、规模和需求的时代。唐代末年中国瓷器开始向世界发布外销信息，其后的1000多年，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这不仅改变了很多地区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也从科技和工业角度改变了世界陶瓷生产的格局。当然，海外的审美情趣、科技因素和生活需求也改变了中国瓷器的文化旨向和瓷性。中国瓷器若以地域划分的话，主要有这么几大瓷器体系：陕西河南河北系、浙江系、湖南系、江西系、福建系、两广系等。下面以这几个系谈谈中国古瓷器在海外的出土、发现和收藏情况。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收藏情况看，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伦敦大学大卫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剑桥的费茨威廉博物馆、剑桥大学博物馆，牛津的亚士摩兰博物馆，爱丁堡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和吉美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瑞典远东博物馆，土耳其的托普卡卜博物馆等1000多座博物馆都有不同数量的中国瓷器收藏。

陕西河南河北系古瓷器在海外的流布情况

陕西河南河北系瓷器代表中国北方瓷器的最高水平。这些瓷器销往海外多半是集中在唐、宋时期。可能外销的主要窑口有邢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北宋官窑、汝窑、钧窑等。自20世纪初以来，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的古代遗址中不断出土唐、五代的邢窑或定窑白瓷。1980年8月，邢窑遗址首先在河北省临城县境内程

村、解村、澄底、岗头、祁村、双井村一带发现，其中祁村窑烧制的白瓷最具邢窑白瓷的特征。根据唐代李肇《国史补》中关于“内丘白瓷瓿，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邢窑的中心窑址在内丘县境内。邢窑白瓷当时便远销海外，在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日本等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均有发现。9世纪中晚唐“黑石号”沉船中发现数量最大的是陶瓷制品，多达67000多件，包括唐代青花花卉盘、邢窑碟子、唐三彩、越窑秘色瓷以及长沙窑瓷。也就是说邢窑瓷器最迟在9世纪已经开始销往海外。在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发现大量唐瓷碎片，种类有唐三彩、邢白瓷等；在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发掘有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前半叶唐朝邢窑产品。官、哥、汝、定、钧等窑瓷器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故外销很少。耀州窑在西安北面铜川地区，以黄堡镇为中心，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等地，此地在宋代属于耀州，故名耀州窑。该窑创烧于唐代（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以烧造青瓷而蜚声海外。宋代王存的著述《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明确记载有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载宋哲宗元祐八年“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实况。耀州窑瓷除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也远销到世界各地。目前已在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发现了宋代耀州青瓷。磁州窑系是宋金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系，以河北磁县磁州窑为中心，窑场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均有分布。磁州窑系诸窑多是综合性瓷窑，兼烧白瓷、黑瓷、彩绘瓷、三彩陶器等品种。磁州窑瓷器在国内很多地区都有出土和发现，海外还比较少见。

湖南系古瓷器在海外流布的情况

湖南各地以及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河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唐墓或唐代遗址中都曾出土有湖南铜官窑瓷器。外省出土铜官窑瓷器数量最多的是江苏扬州和浙江宁波。扬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在唐代是国际贸易港口，波斯、阿拉伯等国商人来此经商的较多，铜官窑釉下彩瓷就是通过这里走向世界各地。在东亚、南

亚、西亚诸国乃至埃及等非洲国家,几乎所有唐代外销瓷出土之处,都有铜官窑瓷器出土。这些标有“天下第一”、“天下有名”的瓷器对沟通中西文化,繁荣唐代经济,提高“唐人”和“瓷之国”的盛名,贡献很大。1998年,一群印尼人潜水采集海参时无意中踩到一堆瓷碗,找获了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唐三彩以及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瓷器多达5万余件,占了沉船瓷器的90%以上——这艘唐代沉没在印尼苏门答腊彭加山岛附近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沉船的打捞,也引发了人们对长沙窑陶瓷的极大关注。国外发现长沙窑瓷器以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伊朗较为丰富,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沙特阿拉伯、伊拉克、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较少。如朝鲜的庆州和龙媒岛等处发现有长沙窑瓷器。1件黄釉褐彩贴花三耳壶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有近30个地点出土长沙窑瓷。如西表岛、福冈市、太宰府市、筑紫野市、六留米市、甘木市、冷泉、三国川町、三日月町等地。印度尼西亚有多处发现长沙窑瓷,如古突土(Kudus)、韦莱里(Weleri)、班查内加拉(Banjarnegara)、巴拉干(Parakan)、井里汶(Cirebon)、唐沽兰、婆罗浮屠(Borobudur)、拉图巴卡(Ratu Baka)等地。伊朗有10多个地点出有长沙窑瓷器,如西拉夫(Siraf)、达伊尔(Daiyer)、比比卡顿(Bibi Khatun)、沙河布杜拉(Shah Abdullah)、特勒莫拉哥(Tel Moragh)、博斯塔内(Bostaneh)等地。泰国有几个地点发现有长沙窑瓷,如打瓜巴(Takuapa,即高巴)、那空寺贪玛拉(Nakorn Si Dhamaraj)、宋卡(Songkhla)、姆安通·克科靠遗址。菲律宾有八打雁(Batangas)、武端(Butuan)、萨马(Samar)等地点发现有长沙窑瓷。斯里兰卡有曼泰(Mantai)、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等地点发现有长沙窑瓷。巴基斯坦有班布尔(Banbhore)和布拉米纳巴德(Braminabad)两个地点出土长沙窑瓷。阿曼的苏哈尔(Suhar)发现有长沙窑瓷。沙特阿拉伯的达兰(Dhahran)发现有长沙窑瓷,现存英国大英博物馆。伊拉克的萨玛拉(Samarra)发现有长沙窑瓷。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考察了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发现有长沙窑贴花壶瓷片。肯尼亚曼达(Manda)岛发现有长沙窑瓷。坦桑尼亚翁古贾·库(Unguja Ukuu)发现长沙窑瓷,是1984年英国学者霍顿等人在此进行考古调查发现的。

以德化窑为代表的福建窑系瓷器在海外的流布情况

福建窑系瓷器主要有两大品种：一是建窑生产的黑瓷，以盏而闻名海外；一是德化窑生产的白瓷而为世瞩目。这两类瓷器毫无疑问都是通过泉州港输往海外的。《宋会要辑稿》中说：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已与广州、明州（宁波）等并列为我国重要商港。陶瓷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远销海外。近年来西沙群岛发现的“华光礁1号”及广东阳江海域“南海一号”出土的大量德化窑瓷进一步证明了德化瓷的外销。福建晋江人李廷机曾谈到：“弟生长海隅，少时尝见海禁甚严，及倭江后，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税以饷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盖以贫民籍以为生，冒禁阴通，为患滋大，而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福建前往吕宋贸易的华商“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史》卷323《吕宋》）。随着嘉靖末年沿海倭患基本肃清，明政府在隆庆二年（1568年）部分开放了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恢复广州、宁波二市舶司，算是正式开放了海禁。隆庆初开放海禁以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更如开闸之水不可遏止。当时，仅福建漳州府的月港一地，出海者每年所贸金钱即“无虑数十万”（[清代]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俗》）。

资料表明，日本全国有近1000处遗址中发现了中国陶瓷，这其中就有福建建阳黑盏，如黑釉兔毫纹盏、银兔毫纹盏、黑褐釉盏等。福建德化生产的明代白釉、清代青花和五彩瓷器，被誉为“世界第一盏”的宋代黑釉鹧鸪斑曜变建盏，就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并作为日本“文化财”国宝，永不出境。

菲律宾人长期以来珍爱中国陶瓷，至今出土了几万件中国瓷器，分藏于桑托斯、洛克辛和罗伯特·维拉诺克三个馆，藏品里就有来自福建泉州、德化的刻花青白瓷、青白褐斑瓷以及福建地区的黑瓷。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馆收藏5000多件陶瓷藏品，有德化窑烧造的海碗、军杖、粉盒、瓶、缸等器，也有书阿拉伯文字的三彩大盘，这些是元末明初德化窑产品；还有书阿拉伯文字的白地青花碗，碗底有“成化年制”的款

识,亦属德化窑烧造之物。马来西亚是目前所知出土中国瓷器最多的地区,沙捞越博物馆仅收集出土陶瓷标本就有100多万片。新加坡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搜集和保存有丰富的德化窑瓷器,其中有高8厘米的宋德化桶形白瓷缸,直径14.1厘米的明德化白瓷盒,直径4.6厘米的德化印花白瓷盒,高11.9厘米的德化狮头双耳白瓷瓶。

在欧洲,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有不少被法国研究学者冠名“中国白”而誉满全球的德化白瓷作品,如明代德化制瓷大师何朝宗传世精品——白釉立像观音。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陈列着商、周至明、清陶瓷的中国馆。在俄罗斯、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瑞典、葡萄牙等国也都藏有德化日用器、玩具瓷、宗教瓷等大量白瓷。在沃尔克所著《瓷器和东印度公司》和《1683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日本瓷器贸易》中,对荷兰与“中国白”瓷的贸易进行了详细研究。表明欧洲各国早在16世纪初期就已经在使用福建瓷器。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达泉州港,在游记中写到:“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音译为德化戴云),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

在非洲,基尔瓦岛的大清真寺遗址、苏丹墓地都出土过德化窑清代的青花瓷器,有些还被寺院镶嵌在庙宇建筑或墓柱上作装饰。

浙江窑系和江西窑系瓷器在海外的流布情况

浙江窑系和江西窑系瓷器是贯穿中国瓷器2000年的重要代表。前1000年中国瓷器属于浙江,后1000年则非江西莫属。可以这么说,在世界上有收藏瓷器的地方,就会有浙江窑系和江西窑系的瓷器。浙江是中国瓷器的策源地,汉季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瓷器;江西则将中国瓷器推向了世界瓷业的巅峰,创造了种类多样、工艺精湛的瓷器形态。浙江瓷器从品种上看主要有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主要以青瓷为主。江西窑系的瓷器复杂得多,从汉季开始冶陶,到宋代开始引起瓷业界的关注,至清代达到巅峰。江西景德镇瓷器从元代以后的700余年统治着中国瓷业江山。

浙江窑系瓷器

越窑青瓷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发现。越窑瓷器的输出路线,主要

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销往日本和朝鲜的商路；一是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至非洲东海岸。史实和考古资料证实，越窑陶瓷主要是沿着“海上陶瓷之路”输往世界各地的。如在日本鸿胪馆遗址、奈良法隆寺、京都仁和寺、立明寺、平城京遗址、于治市、福冈、久米留市的山本、西谷等地也有出土。唐、宋时期输入日本的越窑器，不仅发现了许多完整器和大量的碎片，而且相对年代可考。如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发现的晚唐青瓷盃，奈良平城京出土的青瓷器耳壶，京都市后京区御室仁和寺园堂遗址出土的青瓷盒，宁治市大番御藏山西麓发现的青瓷壶，经考证为北宋初年输入。日本出土的龙泉青瓷，从出土的器型和釉色、纹饰分析，当以北宋和南宋为多，器型以盘、碗为多。朝鲜出土中国陶瓷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出土了越窑青瓷羊形器。忠清南道公州出土了越窑青瓷灯、碗、四耳壶、六角壶等器。新罗首都庆州（庆州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出土了越窑青瓷水壶。开城高丽王宫发现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碎片，在忠清南道扶余县扶苏山下发现有早期宋代越窑青瓷碟。泰国在马来半岛苏叻他尼州的柴亚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瓷器残片，其中有越窑钵、水注及壶等。20世纪以后在印度的迈索尔邦、詹德拉维利等地均出土有越窑青瓷。在南方的迈索尔邦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瓷片。我国瓷器销往印度，在《诸蕃志》、《岛夷志略》中均有著录和记载。

考古证实在斯里兰卡迪迪伽马遗址发现了越窑青瓷残片；在马霍城塞出土有越窑青瓷狮子头；在马纳尔州满泰地区的古港遗址，发现有9—10世纪的越窑青瓷。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前任会长庄良有女士说：“菲律宾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岛屿都出土过中国古陶瓷。”（[菲]庄良有《在菲出土的宋元德化白瓷》，《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2002年，第260—264页）越窑青瓷在马来西亚的发现主要是沙撈越河口的各遗址，出土过9—10世纪的越窑器。印尼也有大量中国瓷器出土，印尼全境几乎都发现了青白瓷，它的数量仅次于青瓷。20世纪以来的考古证实，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岛屿均出土过越窑青瓷，品种有青瓷钵、壶、水注等。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出土有唐越窑青瓷残碗，也有五代、北宋时期的瓷器。

卡拉奇东南的巴博,是13世纪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这里发现了9世纪的越窑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窑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中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中国的丝绸与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爱的奢侈品,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这条商路上,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还是“海上陶瓷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强悍的阿拉伯商人无不显示出这个伊斯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阿曼的苏哈尔20世纪80年代出土过越窑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五六十年代也出土过唐越窑青瓷残片。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伊拉克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据专家分析,与浙江慈溪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他地方也有出土的越窑瓷器。

龙泉窑是在五代、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著名外销青瓷窑口,龙泉窑外销青瓷在中国瓷器外销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宋代,中国瓷器出口开始迅速增加,遍及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和非洲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所提到的从中国直接进口瓷器的国家和地区就有几十个之多,转口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应超过此数(《诸蕃志》2卷, [南宋]赵汝适撰,约1225年成书。作者为提举福建路市舶官,闲时翻阅外国地图,访问外国客商,从他们那里得知各国的国名、风土人情、物产等。上卷叙述亚、非两洲共57国的地理及其与宋朝的关系。下卷叙述47种外国物产,如香料、宝石、珍珠、动植物等)。宋瓷出口的品种主要有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窑的青瓷、磁州窑的黑瓷、越窑的划花器,以及广东和福建等地的青瓷和青白瓷产品等。宋代与海外进行瓷器贸易的国家有:日本、朝鲜、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

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及东非一些国家。

南宋官窑因其特殊性,故直接出口外销的基本没有,现收藏在海外的尤其日本的这些精美的官窑瓷器多是1860年殖民主义入侵开始后陆续被掠夺过去的。这是中国文物非法外流伤心史的开始。

江西窑系瓷器

江西窑系的瓷器主要有两个中心,一是吉州,一是有“瓷都”之称的景德镇。吉州窑以“黑瓷”为人称道。景德镇则从宋代的青白瓷到元代的青花瓷,从明代的单色釉瓷、斗彩、五彩到清代的粉彩、珐琅彩瓷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景德镇的瓷器自陈以来“名”天下,唐代出现了作为朝廷贡品的“假玉器”,到宋代“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但唐代陆羽倡导的“青则益茶”的瓷器审美观念,使得素有“千峰翠色”之称的越窑青瓷遮掩了同时代诸多瓷器的光芒。宋代虽然亦盛行“斗茶”之风,但“陶业咸受王室保护”的大好形势,使得许多瓷器得以亮世。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景德镇以“体薄而润”的青白瓷独揽朝野。尤其是“景德”易名,更加奠定了景德镇瓷器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西方人更是称颂景德镇的宋代为“瓷器成功的时代”。

宋代以后,景德镇的瓷器日益为人们熟知,也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赏识和赞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人生活的内涵。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唐一代,几乎美好的形容词都已为青瓷和白瓷独揽。人们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邢窑白瓷“像银像雪”;越窑的“青”是“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白瓷是“扣如哀玉”、“胜似霜雪”。作为兼于两者的青白瓷,的确令文人们挖空了心思。其实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也谈到唐代景德镇的霍窑所产瓷器“色素,土善膩,质薄,佳者莹缜如玉;……”清人龚轼在《景德镇陶歌》中也说:“武德年称假玉瓷,即今真玉未为奇。”以玉喻瓷,是唐代瓷器审美的重要特征。对景德镇青白瓷的赞美,以宋代词人李清照的《醉花荫》中的句子较有代表性:“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文中“玉枕”,乃指色质如玉的景德镇青白瓷。玉之于文人,是清雅之器,与文人之品格、德性较为吻合,古有“君子于玉比德焉”([西汉]戴圣《礼记·玉藻》)之说。瓷之美者,类于玉焉。李清照温婉之笔

调，忧郁之情思，净洁之心灵，都寓于“玉枕”（影青瓷枕）之中，犹似淡云涵润，加上“影青”寓意“隐情”，含而不露，更赋予了青白瓷诸多神秘的含义。

青花瓷器是景德镇的代表性瓷器品种，元代最为经典，明、清时蓬勃发展，以白地蓝花为主要特征，有“瓷国明珠”之称。青花瓷器也是对海外影响最大的景德镇瓷器品种之一。明代马欢在《瀛涯胜览》中“爪哇条”载：“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18世纪的法国罗可可艺术就曾受到景德镇青花等瓷器的影响。正像日本小林太市郎所说：“当时能提供这种充实的曲线之模范只有中国的工艺美术品。特别是柔软的瓷器的曲线……这种罗可可曲线，它保存了中国瓷器的优雅端庄气派，它含有强大的生命力。”（[日本]小林太市郎《罗可可的形成》，《美术译丛》第8期，1982年）日本人更称明代的青花瓷为“素肌玉骨”。（“素肌玉骨”一词见于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之《陶埏》篇中：“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

青花瓷器明净、素雅，与中国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妙，故多为文人们赏玩、赞美和典藏。文人雅士的砚台笔洗，明、清宫廷的杯盘碗盏，甚至域外皇室的装点粉饰，均能见到青花瓷器的身影。从清人龚轼《景德镇陶歌》可以看出当时人对其的评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吐分明。可参造物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以巧夺天工、造化神秀来形容青花瓷器是不为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景德镇的瓷器品种中，唯有青花瓷器能体现文人的诗境、画境和情境。文人直接参与青花瓷的创作，是作为工艺美术的青花瓷器走向文人艺术情境的主要原因。

与青花瓷器等不同的是景德镇的彩瓷，多倾向于宫廷趣味，体现的是富贵气息，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格调。明、清以后的彩瓷，亦非景德镇莫属。代表性的彩瓷品种有：“粉彩瓷”——有“东方瑰宝”之称。《景德镇陶歌》中说：“白胎烧就彩红来，五色成窑画作开。”“颜色釉瓷”——有“人造宝石”之美誉。经典作品有霁红和霁蓝。霁红又称“美人祭”，《陶歌》中说：“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抟烧百不同。”清高宗有御诗咏“霁青”（霁蓝）：“落霞彩散不留形，浴出长天霁色青。”清代凌汝绵《昌江杂咏》中说：“百种佳器不胜挑，

霁红霁翠比琼瑶。故家盆碗无奇品，不羨哥窑与定窑。”此外，还有“斗彩”、“珐琅彩”等。这些彩瓷多以花鸟等题材装饰，以显富丽之气，呈皇室之威仪。

景德镇瓷器以其优良的品质从宋代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到明代，就像清代沈怀清所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从世界各地考古调查的情况看，无论是直接与景德镇有过瓷器贸易还是没有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收藏有景德镇的瓷器。“镇器遍天下”，一点也不为过。

日本与朝鲜是“陶瓷之路”上与中国较近的国家，也是与中国有2000多年历史文化交往的国家，日本与朝鲜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很少有唐代景德镇瓷器的发现和出土，而较早的则是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景德镇宋代青白瓷的出土数量较同时期的青瓷多。这些瓷器现多收藏在日本出光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福冈市美术馆、浜松美术馆等地。此外还有景德镇元、明时期的瓷器，但很少发现清代的瓷器（刘兰华《宋代瓷器和对日贸易》，《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清代瓷器很少发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桃山时代丰臣秀吉发动的史称“陶瓷战争”（日本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就成为了青花王国的属国，这种说法在当时并不夸张。江西景德镇境内有一座珠山，日本也将一座小山命名为“珠山”；景德镇有一座龙珠阁，日本也仿建了龙珠阁，这个时代还是以向朝鲜发动的两次“陶瓷战争”为发端），给日本的陶瓷业带来了空前的繁盛，并且18世纪末以后日本瓷器（伊万里瓷器）一度取代中国瓷器而独领欧洲瓷器市场。英国人哈里·加纳（Harry Garner）在《东方的青花瓷器》（Oriental Blue and White）一书中有一章谈到了日本的青花瓷器，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很大。

朝鲜于1930年在龙媒岛发现景德镇的白瓷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朝鲜新安沉船中打捞的瓷器。1976—1977年朝鲜文物管理局曾在朝鲜西南海域打捞，共发现白瓷（主要是青白瓷和枢府瓷）2280件，据分析，均为景德镇生产，这些瓷器现大多收藏在朝鲜国立中央博物馆。朝鲜出土的宋代瓷器以景德镇的青白瓷数量为多。

从日本和朝鲜出土的景德镇瓷器看,可以说明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器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同时也印证了景德镇瓷器始于宋代外销的史实。

东南亚是“陶瓷之路”的中转站和避风港,咽喉般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的显著位置,其重要性自唐代以后逐渐显现出来。据估计,仅在马六甲海峡就有近200艘15世纪以后的沉船。这就可以推测在15世纪以前,航海技术相对较落后的一段时期,在印度洋往西的海域不知道有多少航船在此航行、停泊和沉没。一船一船的瓷器,托载着多少商人的美梦和诉说着千载的艰辛与磨难。

12 西亚和非洲是早期“陶瓷之路”的终点,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是区别于17世纪以后这条商路的殖民性。17世纪以后在这条商路上传播的主要是景德镇瓷器。17世纪以前,景德镇瓷器输往西亚和非洲的主要是青白瓷、青花瓷(青白花瓷)等。在西亚,阿拉伯商人控制了大量的瓷器贸易,此外,还有中国和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精明果敢的冒险意识和不畏艰辛的探索精神,以及阿拉伯商人对中国瓷器高超的鉴赏能力是其得以主宰瓷器市场的重要原因。如今在土耳其收藏的世界上元青花最多的托普卡卜·撒拉伊博物馆便是很好的明证。作为当时商业订件如此高质量的元青花瓷在西亚有丰厚的收藏,的确是世所罕见,就连中国本土也难以企及。在西亚,现今遗存的许多商港遗迹,默默演绎着岁月的沧桑。伊朗的西拉夫、伊拉克的撒马拉等,位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更有“通往中国之门户”之称,这里曾留下了许多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友好交往和商贸往来的印迹。

当今并不发达的非洲,可在1000年前则是世界上少有的富庶之地。尤其是北非堪称“中国古瓷的博物馆”,景德镇的青白瓷在宋代就曾到达此地。20世纪60年代,以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等为首的日本出光中东文化调查团在埃及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揭开了1000年前非洲与东方文化交往的神秘面纱。“有世界陶瓷片展览会”的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遗址告诉世人,当时的埃及,几乎家家户户使用过质量精美、价格昂贵的中国瓷器,这一点在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和曾经在埃及作过调查的美国东方文化调查局官员斯坎伦的报告中均可以找到充分的注解。正是在福斯塔特,埃及人认识了中国景德镇的瓷器。非洲的坦桑尼

亚，也是发现中国瓷器较多的地区。英国考古学家惠勒（R.E.M. Wheeler）在其《田野考古学》一书中谈到坦桑尼亚考古时说：“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瓷片，正如过去两个星期我在沿海和基尔瓦岛所见到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瓷片可以整锹地铲起来。”并接着说：“我认为公平地说，就中世纪而言，从10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

景德镇瓷器由“陶瓷之路”输出而形成规模当在元代。元代青花瓷器是当时主要的外销瓷，有“人间瑰宝”之称。这种在中国国内都很少收藏的瓷器，却在域外得到较多发现。据统计，存世的元青花瓷完整器300余件，而土耳其的博物馆就藏有80余件之多。自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元青花纪年款瓷器后，掀起了中国青花瓷研究的热潮。美国人波普也在青花瓷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元代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外销，除了自身优良的品质、快速发达的海上交通外，元代疆域的拓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宽广的一个朝代。

明、清以来，景德镇瓷器全面发展，无论是瓷器生产规模、品种、数量还是瓷器质量、外销力度均居世界前列，从而迎来了中国瓷器史上最辉煌和巅峰的时刻，在瓷都景德镇，人们见到的是传教士登退科尔笔下的“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陶瓷之路”上明代缪宗周《兀然亭》诗中描绘的“舟帆日日蔽江来”的船只也在传诵着“瓷都”景德镇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的瓷器传说，正是基于此，中国瓷器最后的一抹夕阳也在景德镇的上空画了一个美丽的圆弧。回眸一瞥，历史总是在起伏中蜿蜒向前。

毫无疑问，中国瓷器对外输出，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亚洲地区对中国瓷器顶礼膜拜。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中西亚地区，人们将青花瓷奉若“神器”，他们相信青花瓷有预防食物中毒的功效，若食物中放有毒药，青花瓷就会改变颜色。在西亚伊斯兰教国王的宫殿内，成千上万件青花瓷器堆放在地上，或悬挂在墙上，或摆存在橱柜里。在东南亚和非洲一些国家，甚至用青花瓷装饰城门、墓壁以及墓柱。在东南亚地区青花瓷也是人们用来作为随葬的主要物品，在墓葬中往往成套出土。

欧洲对中国瓷器也是狂热崇拜。有资料显示，在18世纪的100年

间,中国输入欧洲的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宗教绘画中,可以看到中国瓷器的身影。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在1514年创作的《诸神的盛宴》中就画有明代中国青花瓷盘,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的地位是很崇高的。1651年,荷兰联合省执政弗雷德莱克·亨利(Frederic Henry)的女儿嫁给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嫁妆就是一大批中国瓷器。而1662年英国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王室联姻,葡萄牙公主也带来了瓷器作嫁妆。17世纪初,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形容当时的“中国热”说:“女王本人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东西。”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更是于1670年突发奇想,在凡尔赛建了一座“中国宫”。整个中国宫的装饰是“中国风格”和“中国情调”。檐口楣柱、墙角四边屋顶都贴着艳丽的瓷砖。室内色彩模仿中国的青花瓷器,白底加蓝色的图案,摆上中国的瓷花瓶、绸帐与金流苏。至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疯狂的“中国热”。

在世界外交史上,还有一则传闻。欧洲15世纪萨克森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由于非常喜爱中国的青花瓷器,曾以4队身强力壮的近卫军士与邻国君主交换12件中国青花大瓶,这就是世界史上有名的“近卫花瓶”。这些瓶至今仍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从这件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也足可以看出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价值和影响力。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记叙18世纪初中国瓷器的情况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糕。”([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毛凤支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8月)

何 鸿 于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品鉴藏与保护专业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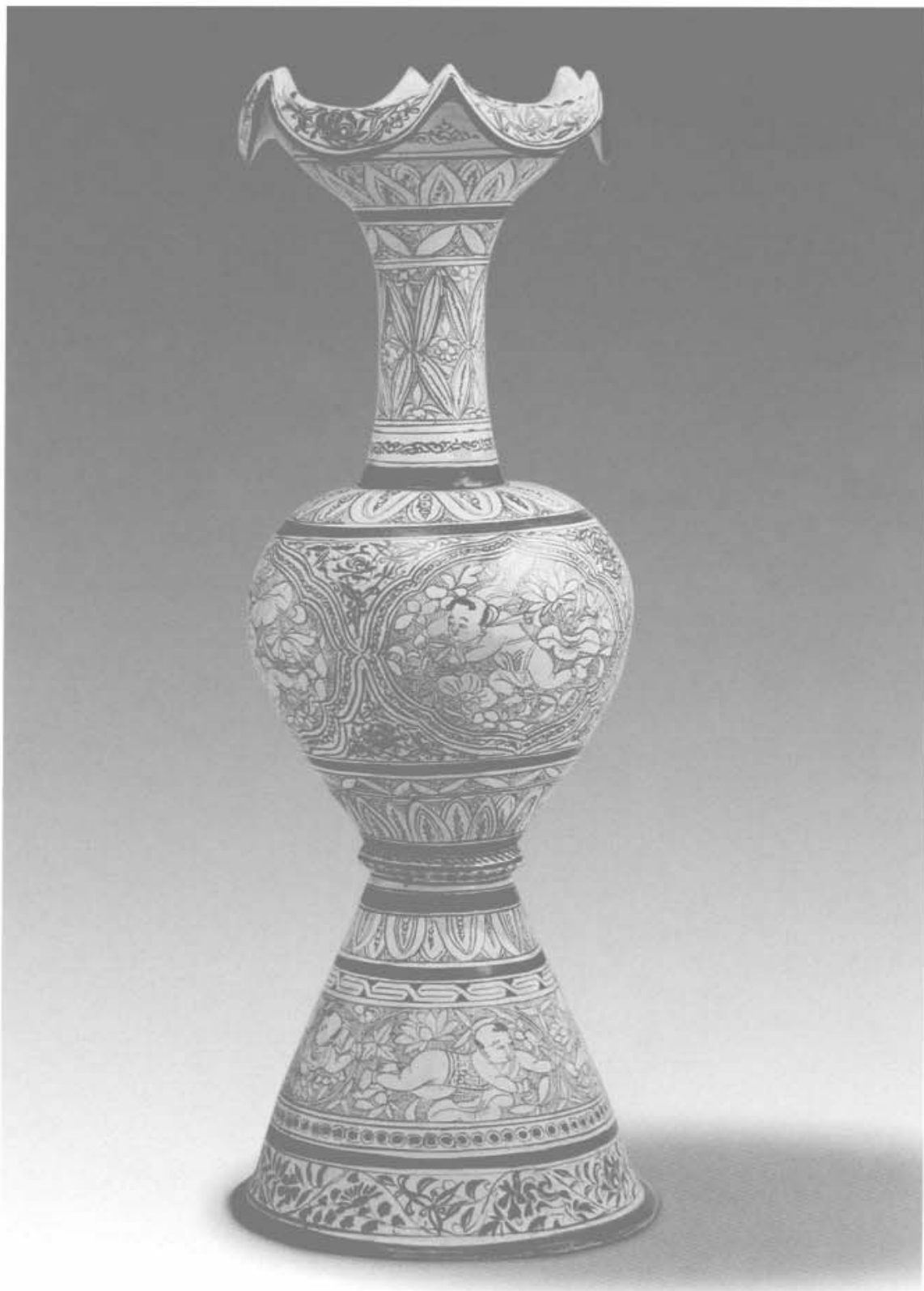
中国陶瓷在海外（代序）.....	001
图版	001
元代瓷器图版	001
元末明初瓷器图版	056
明代瓷器图版	062
清代瓷器图版	190
图版目录	312

图版



元青白瓷雕花束莲纹台瓶 通高24.1cm 胴径11.4cm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Yuan Dynasty: Bluish-white porcelain vase with the carved lotus bouquet decorations and stand. Overall height 24.1cm, body diam 11.4cm.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USA



元白地铁绘童子唐草纹瓶 高88.9cm 口径26.7cm 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藏

Yuan Dynasty: Vase with children and floral scrolls in iron brown. 88.9cm high, 26.7cm diam, The Seattle Art Museum, Washington, USA